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祀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关键词:明代宗族;徽州宗祠;始迁祖;统宗合族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67(2003)05-0101-07

徽州是宋以后中国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学术界对于明代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有所论述,但对其特点的把握还有待深入。笔者依据明人文集、族谱以及乡镇志中以前很少利用的新资料,注意发掘徽州地域性传统因素,试就明代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特点加以说明。

一、明代宗祠的发展以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契机

徽州宗祠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全国位居首位。嘉靖时休宁人吴子玉说:“寰海之广,大江之南宗祠无虑以亿数计,徽最盛;郡县道宗祠无虑千数,歙最盛;自歙水之东无虑百数,凌氏祠巨丽最盛。盖我郡国多旧族大姓,系自唐宋来,其牒记可称已,而俗重宗义,追本思远,险而用礼,兹兹于角弓之咏。以故姓必有族,族有宗,宗有祠。诸富人往往独出钱建造趣办,不关闻族之人。诸细乏者即居湫隘,亦单(当为殫)力先祠宇,毋使富人独以为名。由是祠宇以次建益增置矣。”^[1](卷二二,《沙溪凌氏祠堂记》)徽州宗祠之多,在全国无与伦比。徽州宗祠往往祭祀唐宋时代的始祖,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谈到徽州的宗祠时说:“新都(即徽州)礼仪之国,诸大宗各有祠,郡大夫泽施于民,其后或作寓公于吾土,若程公元谭,若任公昉,迄今血食民间,本支奉之为百世不迁之宗,以昭穆祔,要皆本于仁,起于义,礼所生也。”^[2](卷六九,《潘氏宗祠碑记》)以程元谭等受到地域和本族祭祀为例,诸大宗奉祀始祖是普遍性的,被作为合乎礼仪的仁义行为。

上述表明,宗祠作为明代徽州的文化景观,在全国引人注目。其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的祭祖形式比较多元化,宗族祭祖形式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祭祖依附或与社祭结合,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三是墓祠祭祖为祠祭

收稿日期:200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8BZS004)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明清史研究。

的主要形式。就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长足的发展,成化以来特别是嘉靖年间新建了众多的宗祠。徽州祭祀祖父以上的墓祠不太普遍,而择地另建的宗祠较为普及,宗祠是主祭始祖之祠。明朝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1536)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徽州地方志对祀先之所的记载,由弘治时的祠堂变为嘉靖、万历时的宗祠,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凸显和宗族的制度化与组织化。

为了进一步论证徽州宗祠在嘉靖十五年以后的发展以及宗祠的特点,我们特以歙县岩镇为例。依据清雍正修《岩镇志草》列出的“各族宗祠”,得到21个事例。统计这21个事例可看到以下结果:

宗族祠堂的名称比较统一。21例中有18例是“宗祠”,另外有1例名“家庙”,有2例名“支祠”,还有1例为名人的“祠”,可见岩镇宗族所建祠堂多为宗祠。在宗祠普及以前,国家的制度是建家庙,只有个别高级官僚才可以实现,如文中说方氏家庙“以少司徒弘静公贵得称家庙”。方弘静(1516~1611)字定之,号采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由于方弘静正三品官的显赫地位,方氏宗族将祠堂名为“家庙”。也就是说“宗祠”是作为“家庙”之外的祭祖场所出现的。

实际上宗祠主要是嘉靖十五年以后的产物。21个事例中有20例可以了解到建祠时间。其中正德七年为孙氏宗祠,嘉靖九年的是郑氏宗祠,嘉靖年间有方氏家庙、王氏宗祠、谢氏宗祠、吴氏宗祠(唐家坦)4例,嘉靖十五年以后有吴氏宗祠(双烈庙)、余氏宗祠2例,隆庆时有孙氏宗祠、曹氏宗祠、敕建尚书鲍公祠3例,万历时有汪氏宗祠、郑氏宗祠(南山)、闵氏宗祠、吴氏宗祠(街南)、潘氏宗祠、王氏支祠6例,清代则有胡氏宗祠、阮氏宗祠、方氏支祠3例。可见明代共计17例,在嘉靖十五年以前有2例,嘉靖十五年以后建祠的事例有9例,另外嘉靖年间有4例,嘉靖朝共45年,则嘉靖十五年以后的事例应当居多。因此,岩镇的宗祠基本上是嘉靖十五年以后修建的。

宗祠所在的地点比较分散,并不是朱熹《家礼》要求的居室之东,而是择地另建。

宗祠所祭祖先一般是始迁徽州祖和始迁岩镇祖。始迁祖一般追溯到唐宋时期,尤以宋为多。早已出了五服,个别事例如闵氏宗祠、吴氏宗祠(街南)、程氏宗祠、方氏支祠的始祖溯至唐前。有的事例透露出追溯远祖祭祀是嘉靖十五年以后的事情。如吴氏宗祠(双烈庙),始祖为宋仁宗时用清公,嘉隆之际建祠,上祀至唐代始迁新安的少微公。如闵氏宗祠,宋淳化三年建尊圣阁,祀费公以下历世祖,介绍梁唐间祖先时不曾出现费公,猜想费公当是唐以后比较近的祖先,可见宋代该族祭祀祖先代数还比较控制。阁毁于兵燹,明初复建阁,嘉靖间议改建祠,万历庚辰功毕。由阁改祠,其目的当是祭祀梁唐间各位始祖。有的宗族还有更大规模的统宗祠,如郑氏宗祠(洪桥)即是。

建祠者一般记载是祖先后裔子孙数人或合族,没有对建祠者身份的特别说明,表明建祠者不是高官显宦,但建祠者需拥有一定的身份和财力,当以下层士绅与富有宗族为主。

概括起来就是,岩镇宗族在嘉靖十五年以前只有个别宗祠,此后兴建(少数是改建)了一批宗祠,祭祀始迁祖,这些始迁祖多追溯到唐宋时期。

为了对上述宗祠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我们以潘氏宗祠为例加以说明。据汪道昆《潘氏宗祠碑记》介绍,该族在明代“滋大”。处士逵有三子,长阳江令英,次百岁翁韶,季子黄。嘉靖时身为县令的长子倡议建祠,小弟黄“亟奉金二千金以备经营”,万历十五年至十九年修成宗祠。该建筑“北面为永思堂,凡七达,中奉显祖,左右分曹而度五等,奉五宗,或百世不迁,或五世则迁,悉如礼制。东西为夹室,其上为阁以待祧。东西庑衡二十二楹,北上由中堂,历阶而下,累百步,为方池。中池甃石为台为亭,南北梁之,以通出入,应门九达,左右分聚食待饩之庭。门外为露台,可集数十百众。历阶而下,为皋门,五达,额为潘氏宗祠。西祠节烈、贤良,东祠后土。又下延百堵者三之一,缭以周垣,垣以外则岩溪也”[2](卷六九,《潘氏宗祠碑记》)。潘氏宗祠建筑规模可观,仅潘黄就出银两千两,建筑费用不低,其财力比较充足。而推动建祠者是身为县令的长子潘英。

《岩镇志草》的作者余华瑞面对岩镇宗祠事例,也分析了宗祠兴起的原因及其特点。他说:“庙制定于中古,祠堂起于汉人。”朱子《家礼》所讲祠堂“其制在居室正寝之东,似今人之香火家堂矣。”接着他考察了明代的有关情形:

明初《集礼》: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定制。洪武六年春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当时学士大夫泥于古而惮于改作,因循而莫能更始耳。嘉靖中礼臣夏言本宋儒程颐所修六礼之意,奏请诏令天下臣民得如程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但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聚族而居者,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此宗祠所肇建而名于制实与庙殊,可谓缘于情而不伤于义,起于义而不越于礼者矣。

他认为明代宗祠的兴起在于嘉靖皇帝采纳礼部尚书夏言建议,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和先祖造成的。由于规定“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宗族“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名之为“宗祠”,缘情宜义,起义合礼。他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所谓“宗祠”,强调的是“宗”,即以始迁祖为“宗”的宗族祠堂,不同于朱熹《家礼》设计的祭祀四代近祖的祠堂,也不同于以《家礼》祠堂之制为蓝图的家庙。

二、明代徽州宗祠发展的地域性传统因素

徽州宗祠祭祀始祖发达,确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系。由于纪念越国公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元代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明代的资料可以进一步证明此点。休宁竹林汪氏于嘉靖时建“祖祠”,“奉越国公于中龛室,南向;太和公左室,南向;正一公,汪氏六枝庶共祖,右室南向。……乃奉仲公右龛室,东向;祔少公西向”[1](卷二,《竹林汪氏祠堂记》)。越国公是隋唐之际人,太和公系宋代始迁祖,正一公为汪氏六枝的共祖,均是始祖。而仲公、少公是刚刚去世有功于宗族者,处于配位。这是一座始祖祠。休宁方塘汪氏也于嘉靖时为“宗祠”,“祀越国公、武镇公之主”[1](卷二,《休宁方塘汪氏祠堂记》)。

邵宝《歙县西溪汪氏先祠记》记载:

西溪汪氏先祠者,其族孙灿等即故基而建焉者也。西溪之始迁,实自元宣教府君,以宣教为大宗,而诸宗从焉,礼也。今之祠乃上宗于其古城东关之祖、宋司农少卿公,何居?司农于今十有二世矣。又上宗于其始祖唐越国公、宋加封忠烈王,何居?越国于今三十有五世矣。越国起兵于隋,论者拟诸秦之吴芮;归命于唐,论者拟诸汉之窦融。其于乡也,生有保障之功,没有祈祷之应。故自唐至于今,郡之人皆祠之,盖神之也。而古城东关者,西溪之所自迁也。礼有义起,先民则然,灿也将是附焉尔乎。祠之制,中为堂三间,奉越国像,冕笏命服,南面俨临,盖犹神之也。东为堂三间,中祠司农公,自司农以下仕隐之有声者左右祔,凡四世九人。西为堂三间,中祠宣教府君,自宣以下齿德之有称者左右祔,凡六十有七人。中堂之前为堂五间,如古榭之制,岁时享于斯,荐于斯,燕群族于斯,前门后寝,夹庑周垣,无不具备。乡之人谓是祠也,于昔为盛。

[3](卷二)

这是一座大型宗祠,三堂九间,祭祀汪华、两位始迁祖以及所祔祖先。汪氏族人就“古有祭礼,今之祠于古无所当也”,向邵宝请教。邵宝本来在祠记的开始就指出:“西溪之始迁,实自元宣教府君,以宣教为大宗,而诸宗从焉,礼也。”但他除了借鉴宋儒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的说法外,更认为:“以乡人之义而隆于族,以族人之义而萃于祠,越国焉可也,司农焉可也。越国远矣,泽之在徽者犹未泯也,自乡达于郡,其为祠不一。”即以汪华已经成为徽州乡人共同崇拜的地域神,汪氏当然更要崇拜,对汪氏宗族而言崇拜汪华的表现形式就是祠祭。该祠建成于正德五年(庚午,1510),当时汪华的祠庙“自乡达于郡,其为祠不一”,成为徽州的地域神。汪氏宗族祠庙很早就祭祀始祖汪华,对于徽州宗祠祭祖无疑有示范作用,徽州宗祠多祭始祖,宗祠林立,与汪华信仰不无关系。

事实上,徽州另一古老大姓程氏的祠庙祭祖也具有汪氏的上述特点。程氏始迁祖是东晋初年的

程元谭,永嘉之乱后他来新安出任太守,因有安集还定功,被赐第歛之篁墩,子孙定居于此。程元谭传十二世为梁将军忠壮公灵洗,值侯景之变,他“起乡兵捍贼,歿而为神”,受到历代庙祀。其庙为世忠祠,分衍于徽州的程氏各支派以后不断建有世忠行祠。程敏政谈到世忠祠的由来时说,程灵洗死后:“乡人思,相与祀于故居篁墩,有祷辄应,自宋以来列之祀典,号曰世忠之庙,国朝因之。公子孙最多,散处郡之六邑,又蔓衍于旁郡。每聚处不下数十千指,辄为公行祠便祗谒,由是公行祠布东南,若休宁汉口者其一也。初公子开府威悼公文季,带领父众死节于周。十四世孙御史中丞都史公濬,唐广明中复起义拒黄巢,世守东密岩,事载郡志。东密岩者距汉口最近,中丞十四世孙端明殿学士赠少师秘,宋嘉定中倡休歛族人捐田入篁墩庙,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汉口祀。入元以远弗便,端明三世从孙中山府判愿学始倡族人作行祠于溪西干龙山,元季兵燹祠渐以弊。”^[4](卷一四,《休宁汉口世忠行祠记》)遍布东南的世忠行祠是作为子孙的宗祠存在的,而篁墩的世忠庙可以视为程氏的总祠。篁墩的世忠庙最初具有乡人信仰的地域神性质,至宋被国家纳入祀典,宋以来其行祠分布各地。汉口的世忠行祠是其中之一,该祠在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重修,祠中分左右设威悼公文季、都史公濬之像。程敏政认为:“自兹以往合族于是则昭穆益明,而宗祊不坠;有祷于是则雨暘益时而稔盛不乏。”^[4](卷一四,《休宁汉口世忠行祠记》)反映出行祠兼有族祭和社祭的性质。

江西饶州府德兴毗邻婺源,也有世忠行祠,始建于宋^[4](卷一四,《德兴河口程氏世忠行祠碑阴记》)。

休宁山斗程氏分支,至明代有四百人,“岁时追祀其先,合食其宗,展敬修睦之地,隘莫能容。”鉴于在族长家祭祖地方太小,于是在景泰五年(甲戌,1454)作世忠行祠,为中堂五间。奉程氏广平始祖婴、新安始祖元谭以及忠壮公灵洗三公,“严所自出”;程濬祔于左,“尊大宗也”;山斗始祖思明祔于右,“重始迁也”^[4](卷一四,《休宁山斗世忠行祠记》)。是为程氏宗族兴建的以祭祀众始祖为特点的宗祠。

迁徙到休宁率口一支宋末兴盛,“蔚然硕宗,与篁墩相高”。率口始迁祖为宣议府君敦临,据说他死后子孙相与割田置守专祠。族人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立世忠行祠,为正堂四楹,东西庑八楹,门屋四楹,设置元谭、灵洗、敦临三祖像,妥灵合族。由于子孙日多祠日隘,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增创寝室四楹。率口程氏“每岁正元日,奉三祖像于堂,奠献礼成,长幼叙拜饮福而散。又以元夕前二日为忠壮始生之辰,制花灯以乐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成也有次,其散胙也有规。”^[4](卷一六,《休宁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记》)从世忠行祠的设置目的和族人祠祭活动看,其性质属于始祖宗祠。

休宁荪田程氏于“近世”“立忠社会,岁时合族,为位而祭于家。”弘治十三年(1500)又建成世忠行祠,正堂门屋各五间,两廊十间。正堂分三龛,中左右牌位与山斗程氏世忠行祠相同,左间亦祔程濬,惟“右间祔始迁荪田之祖宋处士诸四,及本支之祖元处士文庆”。由于祠中“皆设主,岁三朝则悬遗像,合族序昭穆拜堂下。越十有三日为公生辰,又合族割牲致祭,制花灯娱神,礼毕序坐饮福而退。如此者凡五日。”^[5](卷一〇,《荪田世忠行祠记》)显然世忠行祠属于宗祠。

世忠行祠以及忠壮生日的祭祖活动遍及程氏各支派。关于忠壮会祭祀的性质,休宁人程敏政(1445~?,成化二年进士)有论述:

我先世祖陈将军忠壮公,以御蕃捍难保境全民之功,在今甲则有祠,在子孙则有会,会在休宁若荪溪程氏其一焉。会之约岁轮一人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忠壮始生之辰,合族人为位于家,行奠献礼,礼毕序长幼饮福而散。盖自其族之诒浩远者始,浩远之子参亨又将申定规、立常贮为远图,而具其事以记请。夫祀之有会,莫知其所从起,然《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庙,用大牲吉。”《象》曰:“萃,聚也。”会因放于萃之义而为之者欤。礼立春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以裕,裕合也。会固有近于礼之所谓裕者欤。裕之名通于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川夫子以义起,则忠壮之会行于孟春固起于义,而非所谓僭者欤。然则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摄众志,岂徒豆笾之丰洁、饮食之充溢而已哉^[4](卷一八,《休宁县荪溪程氏忠壮会》)。

纪念忠壮最初出于官府,所谓“令甲则有祠”,但后来程氏族人为忠壮会,则赋予了“假祖考摄众志”的目的,成为宗族组织化的一项制度。

为菘田世忠行祠撰写记文的婺源人汪舜民(成化十四年进士)阐述该祠的性质:

或曰:士庶人祭其先,制止高曾祖祢而已,今不僭乎?余曰:礼可义起,古之乡先生没而祭于社,矧祖功宗德有不可忘,为子孙者义所当祀也。或又曰:额承世忠,专以事公可也,今诸祖皆在,不泛乎?余曰:古之禘祫总于太庙,分非可比,义则不殊,矧其诸祖之得祀,实因公而推之也

[12](卷一〇,《菘田世忠行祠记》)。

程氏以纪念名人的特祠祭祀超出高曾祖祢四代的诸祖,按照礼制要求有泛和僭的问题,一些人可能不认同。但汪舜民认为程氏的行为属于义行,值得肯定。世忠行祠具有宗祠的性质,而其最初则是纪念名人的特祠。徽州宗族始祖宗祠的普遍性,恐怕同早期世忠庙之类的示范与演变有很大关系。

元代有的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元代陈栎(字定宇)就比较突出。休宁人程敏政《定宇先生祠堂记》记载本县陈村陈氏族人彦威率族人在祖先故居“建祠其中,每岁正月二日合族人等奠献礼”[6](卷一七)。根据该族的陈栎主张,“以八月一日祭始祖鬲山府君,奉以配焉,盖于今三十年矣”。由程敏政(1445~?,成化二年进士,孝宗时官终礼部右侍郎)生活的时代,推测陈氏该祠大约建于成化稍前,但陈氏祭始祖鬲山府君则是元人陈栎的主张。另一事例休宁兖山汪氏,在弘治元年(戊申,1488)重建先祠成,“其中专奉越国公,高曾祖祢左右序列于上,诸旁亲之主左右序列于旁,限以重门,缭以周垣,凡神厨祭器宰之类悉以如式。”程敏政向汪氏族人询问“立祠之义”,回答说:“窃闻吾乡之先有陈定宇氏,一时巨儒,其上世本唐鬲山府君之后,陈氏祠寔中祀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闻浙之浦江有义门郑氏累世同居,其先祠并祀伯叔群从男女之主,上之人尝旌其门,下其家范以风四方,吾之所以建祀旁亲者,用郑氏例也。其余一遵朱子《家礼》与国朝颁行之定式,并行而莫敢戾焉。”[4](卷一六,《兖山汪氏重建祠堂记》)兖山汪氏祭祀始祖汪华是借鉴陈栎的主张以及陈氏祠堂的做法,可见陈栎的主张至少在休宁的影响是不小的。

三、明代徽州宗祠祭祀始迁祖和统宗合族

徽州宗族祠堂祭祀始祖有不少的事例。在休宁,王氏始祖为唐尚书璧,下分县前市北、玉堂里等支,王氏建有大小宗祠。“合诸疏属”的大宗祠“构祠东郭门外,祀始祖而下,合大宗之子若孙,岁时祭、会食有常礼”。小宗祠“祀始迁玉堂祖,迄高祖而下,至父诚庵公,凡五世。帅小宗之子若孙,岁时正月旦、寒食拜祭有常礼,由是近属诸子若孙又知五世之宗矣。……君子曰:祀始迁祖不忘本也,祀高祖而下厚所出也,祀止五世宗五世也。”[1](卷二二,《王氏小宗祠堂记》)该小宗祠建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是先建大宗祠后建小宗祠的事例,在徽州类似者不少,以至有人强调不要只顾远祖而遗忘近亲。说明祭祀始祖在徽州形成传统,并不是只有先建家祠再演变为宗祠一种祭祖变化形态。万历八年(1580)修成的汪溪金氏大宗祠堂,规模宏伟,“堂六楹,高三丈,广倍之,扁曰:敦叙堂。翼下为廊,东西各三楹,前庑四楹,为棹楔,扁曰:昭祐,又曰:大宗祠堂。堂后两旁级而上,中为台,高寻丈。后为堂,广为正堂,奉初祖彦澄公像,台上崇阁五龛室,奉初祖、显祖九祖,扁曰著先楼,不忘本始也。缭以周垣。”[1](卷二二,《汪溪金氏祠堂记》)这样的大宗祠反映了万历时期宗祠的发展。

婺源金村洪氏祖祠,“正寝以奠四代之时祭,典礼也;又为别祠以致一祖、二公之特祭,义起也。一祖经纶公以始迁也,以德也;二公良三、宜三公以起废也,以功也。中室一始祖也,祀以冬至;左右室二公先祖也,祀以清明礼也。又于祠堂萧墙之前为堂三间,左右两廊如堂之数,会宗族合食于斯,教子弟讲习于斯。”[7](卷一八,《洪氏金村祖祠会堂记》)这是比较遵守礼制的事例,虽设立始祖牌位,但祭祀始祖在冬至进行。洪氏的始祖是唐人。婺源桃溪潘氏于嘉靖十五年(1536)建成祠堂,严嵩《潘氏祠堂记》记载:“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则标祀其有齿德官勋及文学科目者、赐封典者,各以昭穆而咸祀。”潘氏始祖也是唐人,严嵩就该祠发表议论:“古礼之不复久矣,昧者安陋,拙者限财,弗得者限制,故举世行者鲜。天子之卿秩视大国之公,潘氏之法固以得准古五庙之祭矣。内而兼少宰司

马之禄，外而合都宪岳伯郡牧之禄，宜为此无难焉。或者以谓服尽之祖远而不祭，有后之宗疏而不祔。先儒以为祀止高曾固也，然充类析义，疑有未尽。故程氏谓祭先之道，但可知者无远近多寡皆得祀。此溯流而源、推枝而干，所谓报本合萃之道也。”[8]（卷二三）认为祭祀始祖符合宋儒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统宗祠。嘉靖《徽州府志》卷二十一《宫室》所列宗祠中有婺源源的萧江统宗祠，万历《祁门县志》卷四《人事志·宫室》所列宗祠中有汪氏统宗祠。另外，徽州“郡中则诸吴甲族，尤著溪南，或统祠或特祠各有当矣。”[2]（卷六四，《溪南吴氏敦本祠记》）休宁南城金氏“合族有统宗祠”[9]（《孟寅公清明会引》）。统宗祠就是大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明代嘉靖时程氏篁墩世忠庙衰败，程辂设想建立统宗祠，他说：“篁墩我程氏根本地也，庙既不有，不可无祠，须近地择建，颜曰：统宗，而买田为世祀计。上祀始祖太守公，以忠壮公配，凡诸分迁之祖，祔诸两旁，子姓岁会而祭告焉。”[10]（卷三，《世忠庙议》）即通过祭祀始祖和分迁之祖统合分迁诸族。为了更具体地了解统宗祠，我们以明代徽州最为宏伟的休宁范氏统宗祠进行考察。范涑《休宁范氏族谱》介绍该祠：

博村统宗祠，即范观察宗祠也。以合七族子姓，骏奔祭事，故名统宗。博村为范姓祖居，旧时各门分祭于寝室，未有祠，祠之议自中支孙正己公始，而力不逮。后人继其志，卜筑于南岸，子侄立尚义会，醮金鸠材，首建寝室九间，以中五间奉先灵，颜曰：孝思堂，东西廊坊为神厨、祭器库，前两廂为斋宿所。又倡率族众捐资建正堂。颜曰：彝伦攸叙，左立慈贞庙，右立止善斋，东西两廊各五间，又令子侄立正己会。前创门屋七间，扁曰：致敬，外树华表，以彰祠名。左右竖碑亭二所，将征名笔勒碑石记事，主之者西野公德芳，助之者辛塘公衍芳、枫敬公理芳、小山公联芳，继庵公孝芳、云庵公洪芳、乐静公泽芳，而协赞之者，则各房各族之英彦有同心焉。经始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重葺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而定龛次立木主与慈贞廊阁，仰德、述功二祠之制，皆于是年成。祠之堂申向，大门改庚向。其栋宇宏丽，翬飞云耸，郡中各巨姓各祠未有过之者。但墙垣广袤，瓦植鳞簇，稍一颓坏，修理维艰（如万历十二年大风，西廊坏，费银一百五十余两。万历十九年风，西廊再坏，并坏祠南正墙，费益倍）雀鼠风雨之虞，预为周悉，是在有孙贤裔加之意焉耳[11]（《祠制·祠表》）。

博村统宗祠，因合七族子姓，故名统宗。该祠有寝室、正堂及附属设施，建筑为明代徽州宗祠之冠。

尽管明代宗祠空前发展，成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主要形式，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地祭祖形式仍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我们以毕氏为例，作一说明。正德修《毕氏族谱》[12]（卷一五，《宫室志》）记载了该族的祭祖祠庙，可知歙县长陔“祠堂”实为宗祠，祭祀始迁祖，以合族，择地另建；“家祠”祭祀近亲五世祖，建于居西附近。而且是先有宗祠后建家祠。照此理解，嘉田、闵川（在休宁）的两所祠堂都应该是宗祠，闵川还有两所墓祠。而毕氏先茔祠建于弘治十四年，是为明中叶仍建祠于墓所的例证。所以，我认为支撑徽州宗祠发展的是民间深厚的各种祭祖与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

四、结语

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合族。徽州的大宗祠亦称统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宗祠作为明代徽州的文化景观，在全国引人注目。

徽州宗祠在嘉靖十五年以后的发展以及宗祠的特点，可以歙县岩镇为例。岩镇宗族在嘉靖十五年（1536）以前只有个别宗祠，此后兴建（少数是改建）了一批宗祠，祭祀始迁祖，这些始迁祖多追溯到唐宋时期。当地人余华瑞认为明代宗祠的兴起在于嘉靖皇帝采纳礼部尚书夏言建议，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和先祖造成的。由于规定“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宗族“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名之为“宗祠”。他的看法与我们研究的结果符合。明代徽州的“宗祠”，强调的是“宗”，即以始迁祖为“宗”的宗族祠堂，不同于朱熹《家礼》设计的祭祀四代近祖的祠堂，也不同于以《家礼》祠堂之制为蓝图的家庙。

徽州宗族始祖宗祠的普遍性,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的示范和演变有关系。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元代陈栎就比较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统宗祠。统宗祠就是大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即通过祭祀始祖和分迁之祖统合分迁诸族。统宗祠的增加,说明了明代徽州宗族规模的扩大和组织化。

尽管明代宗祠空前发展,成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主要形式,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地祭祖形式仍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支撑徽州宗祠发展的是民间深厚的各种祭祖与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 (明)吴子玉. 大鄣山人集[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
- [2] (明)汪道昆. 太函集[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
- [3] (明)邵宝. 容春堂后集[M].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 [4] (明)程敏政. 篁墩文集[M].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 [5] (明)汪舜民. 静轩先生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
- [6] (元)陈栎. 定宇集[M].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 [7] (明)湛若水. 甘泉文集[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
- [8] (明)严嵩. 铃山堂集[M]. 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
- [9] 休宁南城金氏族谱[M]. 合肥:安徽省图书馆藏明抄本.
- [10] (明)程辂. 程氏祠墓志[M].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刻本.
- [11] (明)范涑. 休宁范氏族谱[M]. 合肥:安徽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 [12] 正德毕氏族谱[M]. 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

The Ancestral Hall (Temple) in H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History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H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one of the regions where the system of patriarchal was well-developed and perfect. There the building of ancestral temple was common. The writer in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further argument to prove that the decree of offering sacrifice to ancestors enacted in the fifteenth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1537)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developing the system of ancestral temple in Huizhou. The thriving of offering sacrifice to the first immigratory ancestor in Huizhou was nodoubtly related to the worship of Wang Hua and Cheng Lingxi who were immigrants becoming local goddized images to be worshipped for their meritorious feats (for detail see the text). The scholars of Huizhou origin in the Yuan Dynasty advocated the system of offering sacrifice to the first immigratory ancestors giving impetus to the building of ancestral temples. The opinion that the character of building ancestral temples in H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offering sacrifice to ancestors, i. e. the offering sacrifice to the first immigratory ancestors possesses the function of gathering all the clansmen into one.

Key Words: Patriarchal Clan in the Ming Dynasty; Ancestral Temples in Huizhou; The First Immigratory Ancestor; Gathering All the Clansmen Into One